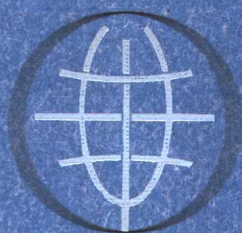


民族国家是未完成的国家，世界主义国家将取而代之

(MACHT UND GEGENMACHT
IM GLOBALEN ZEITALTER)

全球化时代的 权力与反权力

[德] 乌尔里希·贝克 著
蒋仁祥 胡颐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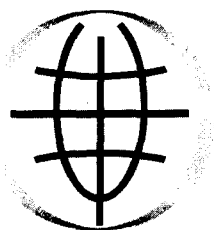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MACHT UND GEGENMACHT)
IM GLOBALEN ZEITALTER

全球化时代的 权力与反权力

[德] 乌尔里希·贝克 著
蒋仁祥 胡颐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Macht und Gegenmacht im globalen Zeitalter

By Ulrich Beck

Copyright©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2002

Translation copyright©2004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20-2003-16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化时代的权力和反权力/(德)贝克著;蒋仁祥,
胡颐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9

ISBN 7-5633-4914-6

I.全… II.①贝…②蒋…③胡… III.经济—
体化—影响—研究—世界 IV.F114.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6586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北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965mm×1270mm 1/32

印张:12 字数:306千字

2004年9月第1版 200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6000 定价:24.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乌尔里希·贝克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慕尼黑大学教授，长期从事社会发展和全球化问题的研究，提出了“风险社会”、“再现代化”等产生广泛影响的重要概念。主要著作有：《什么是全球化》、《风险社会》、《自由之子》、《反思性现代化》、《全球化的政治》、《西方社会的前景》、《自由与资本主义》等。



民族国家是未完成的国家……谁在世界性的超级游戏中只打民族国家的牌，谁就输。

世界主义国家——我们已经作了各种不同的论证——是通过与全球公民社会的融合而形成的国家。

——乌尔里希·贝克

契机：右翼民众主义在欧洲的兴起

一个已经形成疆界和基础的世界是没有任何前途的，右翼民众主义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兴起，可以说就是对此作出的反应。占统治地位的机构和精英们之所以意识不到这种新的社会现实，进而对它进行创造性的改造，主要得归咎于这些机构的布局和它们的形成过程。它们产生于这样一个世界：拘泥于充分就业的指导思想、民族国家对民族经济的政策、现行有效的疆界、明确的领土主权和地位。我们以人们密切关注的一些关键话题为例进行解释：谁不顾大规模失业和正在迅速蔓延的棘手的就业问题，宣扬充分就业，谁就是在讥笑人类；谁在平均出生率已经降低到可怕的1.3%的国家，宣布养老金有保障，谁就是在讥笑人类；谁面对工商业税收急剧减少，允许跨国公司利用各国相互竞争和不纳税的全球化大唱赞歌，谁就是在讥笑人类；谁不顾多民族社会所陷入的冲突，宣扬跨文化的异族之爱，谁就是在讥笑人类；谁在流行的或者危险的环境灾难频仍的时代，宣称技术和工业会解决由其造成的副作用问题，谁就是在讥笑人类。

我们欧洲人就是这样做的，仿佛一如既往，认为只有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葡萄牙等国家。然而它们早已不复存在，因为封闭的民族国家的权力容器和相互隔绝的社会单位，至少从欧元启用之日起就已经属于非法。既然有了欧洲，就不会存在德国，不会存在法国、意大利等等，这些国家仅仅在人们的头脑中，在历史编纂学家的画册里仍有支配权，因为赖以建立民族国家的疆界、管辖权和经验的空间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如果这一切已经过去，如果我们按照左姆比（Zombie-Kategorien，南美神话中的蛇神，比喻乖僻的、独特的。——译者注）的方式去思考、行动和研究，试想已经发生或者将要发生什么事呢？

这就是本书提出和试图回答的问题。一种尚不为人所理解的边界政策，一种没有边界和新旧疆界以及原动力（不久，就只能在跨国的意义

上，在世界内政政策的原始框架内，而不能在本民族国家的意义上理解的原动力)的相互交融业已产生。正是对原有安全的企求——惩治犯罪的斗争、排斥外国人以及寻求庇护者——迫使人们放弃本国警察的暴力垄断和边界保护，即放弃神圣的主权，以恢复国家的安全和主权。

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了改变基础的副作用问题，同时，以自我为核心的政策不再有效，在这二者的相互作用下，形成了某种禁区，禁止通过大众媒介制造伤害，从而使右翼民众主义获得了意外的机会和反响。这还不够，这一切还表明，作为反对者，民众主义对已达成的政策共识具有反驳的能力。为了理解右翼民众主义利用和制造的这种政治地震，必须揭示它的权力来源。这个来源就是：在欧洲现代化方面所作的反宣传的动机和主题——反对衰败和颓废的斗争，旧的价值和关系的再生——被运用于这个激进的现代化的禁区。就此而言，刺激手段是把重新混淆政治阵线的“肯定原则”发挥到极致。所谓的“右翼民众主义”不是只指右翼民众主义，也指左翼民众主义。它的权力和令人不安的潜在能力在于，这种类型的政策结合、吸收、组合、综合各种似乎可以排除的因素：用左的方法达到右的目的，即通过大众媒介的宣传打破禁区，以便发挥反现代化仇恨的最大潜在威力。公众的反应也可以表明这一点。民众主义者的蛊惑宣传对已经确立的民主构成威胁，这种宣传虽然遭到了谴责，但是，它至少在局部作为一种它们必需的、能使人振作的休克疗法受到了欢迎。因此，民众主义者的权力很大，就像现行政策对是否彻底改变世界的问题无从回答所产生的影响一样大。

这一点(在本书中)就像在凸镜中一样可以反映出全球化的副作用。在公众的讨论中，“全球化”一词被一部分人当作胡说不予理睬，相反，被另一部分人高度概括为人类必须遭遇的新的命运。社会科学界的讨论对这两种互不相让的观点未作评判，而是提出了两个迄今为止比较特别的方案。第一个方案在日益扩大的相互关系方面(Held, 1999; Beisheim, 1999)，也就是说，在相互依赖、相互交织、跨国流动、身份地位和社会网络的意义上思考和研究全球化问题。第二个方案强调通过时间扬弃空间(Harvey, 1990:229; Giddens, 1997)，这种扬弃将使新的交往方式成为可能。越来越多的个人经营跨国界，工作跨国界，恋爱跨

国界，婚姻跨国界，生活、旅游、消费跨国界，生儿育女跨国界，也就是说，通过世界各地的电视和互联网接受教育，而且连政治身份和法律身份也不再顾及本国法定的一夫一妻制。全球化在这里不再是（像第一个方案那样）作为民族国家的社会空间之间的日益紧密的相互交织，而是作为这个空间内在的全球化本身所设想的。

在本书中，在接受上述两个方案的同时，再向前迈进一步，将全球化理解和阐释为历史的转型。因此，在一个尚不明朗的世界内政政策的权力空间中，要用迄今沿用的世界观区别民族的和国际的。当然，作出这种区别的着眼点鲜明地表达了第一次现代化的世界观以及关于社会、地位、国家、主权、合法性、政权和统治的关键概念（和理论）。因此，本书提出这样的问题：怎样理解这个世界和世界原动力？在这个世界中，极端的现代化的副作用正在撤除民族国家秩序的支柱和无所作为，即某些历史地形成的基本区别和基础设施。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将在单独的章节展开和阐述）是，此时此地在国内和国际运作的世界内政已经演变成一种从其结果看完全公开的转移权力的游戏，在这场游戏中，边界、基本规则和基本差别都是国内和国际的（世界经济和国家）跨国运作的公民社会运动，超国家的组织、民族国家的政府和组织重新再讨价还价的结果。

如果民族的东西不再是民族的，国际的东西不再是国际的，那么，拘泥于民族国家视角的政治现实主义将是错误的。代替政治现实主义——这是本书的论据——的将是一种从其权力逻辑可以推导出的世界主义的现实主义，这种现实主义将把各国相互交融和相互竞争中的世界经济实力及其代表的决定性作用列为重点。比如，跨国的公民社会运动，其中包括非公民的战略，即恐怖主义网络的战略就动员已经实行私有化的政权反对国家，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

马基雅维利所说的世界主义的现实主义特别回答了下面两个问题：第一，世界经济的代表怎样和采取什么战略迫使国家放弃自己的行为准则？第二，国家从自己的角度来说，面对世界经济的代表怎样才能夺回国家政策已经转移的权力，以便迫使世界经济资本放弃包括政治自由、世界正义、社会安全和生态持久性在内的世界主义体制？这种新的世界

政治经济学之所以意义重大和具有说服力，是因为，一方面它作为一种跨国经济学的战略活动空间的权力理论获得发展，另一方面它同时也着手研究自己提出的反问：为迎接世界经济，当然还有现代化的全球性副作用问题的挑战，怎样开放按国家形式组织的政治的（基本概念、战略权力空间、机构框架条件）世界？

对全球性文化的不断深入人心，也许可以说日益扩大的优势来说，已有许多迹象表明，在全球现代化的瞭望塔上，世界问题早已见多不怪。气候变化、环境破坏、食品风险、全球性金融风险、难民潮、遗传学和人类基因学以及纳米技术创新的可预见的副作用等等，对共同生活的基础提出了质疑。民族国家也不是包含所有其他重要框架，并且能使之作出政治答复的参考框架的创造者。此外，特别是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告诉我们，实力并不等于安全。只有到了有决心和能力用他人的排他性眼光观察一个被现代化束缚了的世界，使之在文化层面上觉醒并成为平凡的世界的时候，在这个彻底被分裂的世界上才可能有安全。达成这个意义上的世界主义的共识，弘扬承认他人渗透着种族的、民族的和宗教传统的、在交往中复苏的精神，在“9·11”事件以后不再是一种道德败坏的幼稚的文字魔术，而是一个生存的问题，而且恰恰是军事强国的生存问题。

就此而言，读者阅读本书后，也许可以回答右翼民众主义怎样在精神上、道德上和政治上发生转变的问题：如果不顾国内和国际的旧标准，在构想上和政治上开辟世界内政的权力空间，那么，政治和国家的世界主义创新将有广阔的前景（同时宣布右翼民众主义的反动）。

实行全球化需要人们转变视角，即从民族国家的视角转向世界主义的视角，而且要设法理解这种视角的转变以及它的现实意义和重要性（还有危险），从而理解本书。为了证实这一点，这里给性急的读者提一个建议：您最好从本书的最后一章《写给正在到来的世界主义时代的简短悼词》开始阅读，然后再阅读前一章《国家和政治在第二次现代化中的概念转变和形式转变》，然后再去阅读前言。

2002年6月于慕尼黑

前言

我们选择的人没有权力，而握有权力的人，我们没有选择。

——一个示威者的海报

什么是全球化时代的合法统治的基础？这是目前争论的最现实的问题。而对这个问题的不安，即是撰写本书的动因：当我们把“政治”和“国家”这类词语经常挂在嘴边的时候，我们以为知道、实际上并不知道我们在说些什么。众所周知，政治是议会、政府、政党、大选关心的事。但是，这个预备的答案能清楚地回答有关合法统治基础的所有问题，因而不妨碍我们理解那些震撼世界的权力斗争所使用的语言吗？

我们还以为自己已经心中有数，只要向某一级主管部门呼吁，公众的福利问题最终就能得到解决。但是，我们只要看看报纸的经济版，就会知道，资本流正在流向这里或那里，正在流向世界市场规则，而世界市场规则就是逃避各个民族国家税收。劳动力的输出、生产的灵活的本地化、信息流、全球的数字世界、跨国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联盟——这一切都正在对我们的生存条件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必须看到，“全球生态危机”或者“国际政治经济学”等等这些各国专家正在讨论的关键问题决定着政治的议事日程。法学专家的解释是国际性法律的制定，国际案件的判决，不再由各个国家承担。本地的生产者组织在全球活动，而全球性的跨国公司则传说在实行本地化，同时逃避向本地缴纳税收的义务。对别国的军事干涉都是以保护人权的名义进行和完成的，或者，再举一个例子：恐怖主义嫌疑的普遍化，诱导民主主义强国和其他国家出具对付“恐怖主义者”的通行的“围剿专利证书”。也许还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我们将迈步

进入一个“永久和平”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不用再划定“永久战争”的界线，因为一种比战争更可怕的“和平”已经确立。然而，在这样的条件下，“合法统治”的可以模糊和混淆的边界和区别是什么呢？

正如本书的主题一样，目前以民族国家为主导的“合法的”世界秩序正在创造性地走向自我毁灭。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发展过程，当然，这个过程（连同其他许多方案）也为“世界主义视角”提供了可能，或者说，其中孕育着政治向“世界主义国家”继续发展的可能。可见，这里不仅涉及各种文明之间的冲突，而且涉及争取各种不同的传统都能在其中共同生存的人类文化的斗争。任何保护措施都不能保护世界其他地方的处于人道主义灾难中心的国家，现代文明的自我毁灭不是以种族、民族或地区来划分的。

一种新的世界主义的现实主义正在诞生！然而，为了能从康德以来就属于西方文明的世界主义概念中引出对各种占统治地位关系的现实主义批判，必须对它进行去粗取精的处理，进行“拯救性的批判”（瓦尔特·本雅明语）。我所说的“世界主义”不是指那种将意识形态矛头对准跨国精英和组织的神圣权利的理想化的精英概念；我脑海中浮现的是更多地承认价值的、活生生的多样性，在这种多样性中贯穿着世界主义共识意义上的各种社会状况和历史联系，而这种共识会被大多数人所理解，并使之进行似乎不可阻挡的发展。

第三个千年伊始，民族的现实政策的原则——本民族的利益必须由本民族去追求——必须为世界主义的现实政策的原则所取代：“我们的政策越是民族的，越是成功的，就越是世界主义的。”即使不存在世界性的问题，也要把它杜撰出来，因为它会创造出跨国的共性。在头脑中反映出来的有关领土主权的零和游戏是历史性的错误，因为相互依赖关系的建立必须当作逆向取得权力的包赢游戏来进行和理解。

本书将阐明现代世界主义的现实主义似乎正统的核心论点：在全球性危机和风险的时代，应当奉行“金手铐”政策，建立跨国的依赖关系的密集网络，而且恰恰在高度活跃的世界经济获得权力时，夺回民族的独立性。

各种充满矛盾的文化流派在狭小的空间内相继出现并且进入——

往往冲突不断——各种团体。有些人两面三刀，擅长背弃熟人，居无定所，职业变化无常，越来越多的人备有双重护照，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而又不愿放弃原来拥有的身份地位。地方主义生了根，长了翅膀，外加实际生活中的世界公民的经验宝库，因而这个共同文明的分母有可能成为世界文化方面的异质社会，有可能回答下面这个到处都觉得致命的基本问题：这个世界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秩序？

承认差别——不能同规定的异族婚姻相混淆——将开辟一个四维的机会空间，但是，承认差别本身也不无偏激的内在矛盾。这既完全涉及贫富之间，北南福利小生境和贫困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问题，也完全涉及人的符合尊严的生活条件问题，更涉及是否存在按世界的标准建立微型福利国家，即实行“全球化的凯恩斯主义”的可能性问题，虽然这种微型福利国家依然遵循基本需要的最低道德标准。这个问题涉及方方面面。世界主义视角关注的是如何才能为迎接全球化时代的挑战，自下而上、自内而外地长期开放民族国家的基础设施；怎样对待边缘人、外国人和被排斥的人。但是，世界主义视角特别关注的是处在这种条件下的国家和政府的业已彻底改变，而且还在改变的作用，各种利益集团和党派在巩固和扩大全球化时代的民主的过程中，提出的人权问题、对国家而言职能均等的问题，特别是怎样预防因人们的失望和尊严的丧失而出现权力膨胀的问题。

可见，世界主义视角是将对文化不同的他人的尊重与每一个个人的生存乐趣结合在一起的。换言之，世界主义是一种继历史地衰退的民族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之后出现的又一伟大思想，这种思想也许能使人类活过 21 世纪，而不倒退到野蛮时代，将这种不可能变为可能。

世界市场的经济学通过自己的强制动力改变了世界政治的规则。由于模糊了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界限，所以一场围绕权力和反权力的斗争已经开始。更有甚者，合法统治的规则需要重新协商。但是，所谓不可抗拒地会产生“世界主义的现代化”，这种知识是不值得庆祝的，而且是非常矛盾的——这一点在 20 世纪随着政治的彻底放松，根据经验怎样变成另一种样子？将记忆中的在民族国家意义上设

计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整个观念世界称为第一次现代化，以区别于尚不明显的第二次现代化——由全球性的生态和经济危机，日益突出的跨国的不平等，个体化、脆弱的职业劳动和文化、政治和军事全球化的挑战来界定——目的在于，克服在双边世界秩序崩溃以后一度使欧洲处于瘫痪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反动”。因此本书的重点是描述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学、政治手段和国家独立性的原始变迁：表面上一成不变的指导思想和变化的基点正在发生变化，因而权力和统治的基础和基本概念、合法地位和政权、经济、国家及政治同时也在发生变化。如何把第二次现代化变成世界主义的现代化？提出这个带有指导意义的问题旨在实现一种以政治自由以及社会公平和经济公平（而不是以世界市场规则）为中心的替代制度。全球化受反对穷人的富人所支配，它不是由各种不同社会的跨文化的互动，而是由一种纵容特殊群体反对所有其他群体的行为向前推进。世界主义的想像代表着人类本身及其利益。这是打破常规，自以为是对相互依赖和相互关系重新进行思考的尝试，也就是说，是本着世界主义的现实主义的精神，打开眼界和增强洞察力，对我们在其中生活和活动的、尚不明朗的、由“各地”结成网络的社会进行思考的尝试。

与我创作的任何一本书相比，我都要把本书的完成归功于朋友和同仁的帮助。埃德加·格兰德体现了我们慕尼黑的特殊研究项目“现代化反思”的共同的首创精神，他在数天的讨论中参与完成了本书思想体系的架构；还有克里斯托夫·劳，也是我们研究中心具有首创精神的人物，他也经验地参与了“现代化反思”的理论阐述，利用他充满幽默的智慧多次对本书提出修改意见；鲍里斯·霍尔策是少数精通对立的社会科学文化的人士之一，非常感谢他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给我提出的宝贵意见；阿尔穆特·克赖纳为本书付出的心血甚于我的写作，却毫无怨言；阿尔明·纳瑟西、卡尔·帕罗纳、沙里尼·兰德里亚、纳坦·施奈德、波普·耶索普、马茨·索伦森和彼得·维灵都对我的初稿提出了非常中肯的意见。

安东尼·吉登斯院长主持的伦敦经济和政治学院充满催人奋进的学术气氛，我能参加该院的工作，是我的荣幸和快乐。该院对本书的

世界主义构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该院的同仁中对我提出宝贵意见的还有：马利·卡尔多、戴卫·黑尔德、萨斯基亚·萨森、理查·森奈特、拉尔夫·达伦多夫、斯坦利·科恩、唐·斯拉特、罗杰尔·西尔维斯顿，等等；通过戈德斯密斯大学的介绍，我还征求过安戈拉·麦克罗比和司各特·拉施的意见。最后一点，但不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尤尔根·哈贝马斯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与我谈了他对本书初稿的看法。我对我的学术界同行约翰奈斯·威廉斯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当然，本书的完成，首先还应当归功于我的夫人伊丽莎白·贝克-根斯海姆，因此对她仅仅使用“感激”这类字眼是远远不够的。

大众汽车公司基金会的慷慨解囊使我完成了本书的写作，在此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乌尔里希·贝克

目 录

- 契机：右翼民众主义在欧洲的兴起 / 1
- 前 言 / 1
- 第一章 以世界主义为着眼点的新批判理论 / 1
- 第二章 民族视角批判 / 36
- 第三章 改变规则的世界内政：经济、政治和社会失去边界 / 52
- 第四章 全球化时代的权力和反权力：各种资本战略 / 120
- 第五章 再国有化和跨国化之间的各种国家战略 / 172
- 第六章 各种公民社会运动的战略 / 242
- 第七章 国家和政治在第二次现代化中的概念转变和形式转变 / 255
- 第八章 写给正在到来的世界主义时代的简短悼词 / 287
- 译后记 / 319
- 参考文献 / 322

第一章 以世界主义为着眼点的新批判理论

第三个千年伊始，人类的未来似乎豁然开朗了，弗里德里希·尼采、卡尔·马克思、伊曼努尔·康德和马克斯·韦伯预言的事情就要发生了。

尼采早在 150 年前就要求：“欧洲作出决定……以便结束其策划已久的小邦林立的闹剧及其专制的或民主的无谓争吵。小政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下一个世纪将开始争夺世界统治的斗争——不得不实行大政治。”

在此之前，康德对实行大政治的指导思想，即世界主义早有预感：“设想自己依照公民权成为世界公民中的一个协调的环节，是人们能够按自己的想法考虑问题和不无热情地思考出来的崇高思想。”

卡尔·马克思曾经预言，这将使资本变成全球化的资本，而不是各个国家的政策，它将打破民族的政治常规，开始大政治的游戏。

“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共同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将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世界的文学。”

马克斯·韦伯最后为历史科学得出了结论。他说：“但是，颜色是随时变化的：不经思考就发表的观点是不可靠的，道路消失在朦胧之中。解决大文化问题的曙光将光芒四射。到那时，科学就会准备改变自己的地位和自己的概念，从思想的高度俯视事件的洪流。”

一、世界政治的超级游戏

迫使向大政治发展的这种或那种观点、矛盾和结论可以阐述、阐明和解释为世界政治的“超级游戏”这个概念。

超级游戏的意思是：运用规则的旧的世界政治和改变规则的新的世界政治是相辅相成的，就具体的代表、战略和联盟而言，是不能分离的。有人认为，在正在过去的民族国家的时代和正在到来的世界政治的时代这两种灯光下，政治表演服从于两种完全不同的，但相互之间有着密切联系脚本，不同的剧团按照各自的观点在世界舞台上表演不同剧目，在演出中，定型的和替代的政治戏剧，封闭和开放的政治戏剧矛盾地相互交织在一起。这种观点，除非可以得到明确的证明，否则既混淆视听，也混淆现实。正是这种现实存在的标准、分镜头剧本、表演和演员的混淆，甚至在演出过程中对世界政治这出剧目的改编，是超级游戏的本质。

世界政治的游戏规则体系因制度和组织的不同而各异。制度是指行使权力和统治过程中的现行基本规则和背景规则，即为了使民族的和国际的政治实践的某些形式成为可能的，或者预先规定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行为规范。属于第二次现代化民族国家的权力游戏的设施，比如有：有限领土主权的国家监督、国际承认和外交、权力手段的垄断、法律主权，还有福利国家的安全、公民的和政治的基本权利，等等。制度像基本标准和基本形式一样，规定了政治行动的标准框架，而组织是指拥有一定数量的成员，拥有经济和空间资源以及拥有一定的法律地位的代表。我作了粗略的分类，在超级游戏中有三种组织，即国家、世界经济的代表和世界公民社会的代表。

各种制度和组织之间的相互协调从主流的理论争论来看，是由行动的两种逻辑，即詹姆斯·马奇和约翰·奥尔森提出的预期结论逻辑和适当行为逻辑决定和解读的。根据预期结论逻辑，政治行动是发生在服从最大化原则的——可以使有关不明确的优惠条件的现有定律发挥最大作用的原则——合理的行为考虑之后。古典的游戏理论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就是这方面的例子。与此相反，按照适当行为逻辑，政治行动是在既有情况下刺激适当行为的权力、作用和地位的产物。

(March/Olsen, 1989; Krasner, 1999)

超级游戏理论介于预期结论逻辑和适当行为逻辑之间，因为它遵